

#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资源的变迁及启示

赵爽<sup>1</sup>, 郝宇青<sup>2</sup>

(华东师范大学 1. 政治学系; 2. 公共管理学院, 上海 200241)

**摘要:**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史中, 其政治合法性资源因不同的历史时期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旧社会的“负面合法性”和苏联榜样的示范构成中共的三大合法性来源。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前30年间, 意识形态成为中共的主要合法性来源。在改革开放期间, 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政绩合法性成为中共执政重要的合法性资源。进入新时代, 中共执政合法性的生产和再生产模式又呈现出新的特点, 即由过去的特定合法性资源的生产和再生产转向散布性合法性资源的生产和再生产。从中共政治合法性资源建设的百年历史中, 我们可以得到诸多的启示。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一百年; 政治合法性; 变迁; 启示

**中图分类号:** D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21)02-0012-07

## Changes and Enlightenment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Resourc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Past 100 Years

ZHAO Shuang<sup>1</sup>, HAO Yuqing<sup>2</sup>

(1.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2.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In the 100-year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ts political legitimacy resources have shown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due to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During the new-democratic revolution, communist ideology, the “negative legitimacy” of the old society and the demonstration of the Soviet model constituted the three sources of legitimacy of the CPC. In the first 30 years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in 1949, ideology was the main source of legitimacy of the CPC. During the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legitimacy of political achievements based on economic growth constituted an important legitimacy resource for the CPC's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the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mode of CPC's ruling legitimacy presents new features, that is, varying from the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specific legitimacy resources in the past to the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distributed legitimacy resources. We can get a lot of enlightenment from the 100-year history of the CPC's political legitimacy resources construction.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100 years; political legitimacy; changes; enlightenment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时, 即高举着共产主义的伟大旗帜, 以消灭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 实现社会平

收稿日期: 2021-01-1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层党组织的政治生态评估体系与优化策略研究”(编号: 17CZZ041); 2021年度华东师范大学理论研究课题“‘用经济手段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策略的成就与局限”

作者简介: 赵爽(1992-), 女, 河南南阳人,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政治。

郝宇青(1970-), 男, 山东东明人, 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与战略研究所所长, 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政治、基层社会治理等。

等为根本目标。尽管在当时的中国,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秉持特定“主义”、以改造中国社会为目的、进行救国救民的探索和实践的政治组织,但是,经过血雨腥风的历史的检验和人民的选择,最终是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人民群众,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重大转变。由于革命党和执政党的任务不同,因而这一转变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模式具有重大影响。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的不同历史时期,所面临的历史任务和工作的重心各不相同,因而在执政的不同历史时期,其所拥有的合法性资源也是有所差异的。这种情况说明了政治合法性具有一个重要特点,即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必须根据实际的国情、党情、民情的状况而进行合宜的调整,即进行合法性资源的再生产。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的执政拥有充分的合法性资源的支持,保证国家政权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平安。有鉴于此,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回顾党的政治合法性模式变化过程,探讨其发展变化的规律,对于更好地进行合法性资源的生产和再生产,更好地提升中共的执政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大合法性来源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虽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掌握政权,但是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调动一切有利于革命的积极因素,赢得民众广泛的认同和支持,因而仍然存在合法性的问题。当然,这一时期的合法性问题,主要表现为与国民党的合法性争夺。此期间中共所拥有的合法性资源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共是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自己革命的指导思想和建构未来社会的制度安排的。对此,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党走过二十八年了,大家知道,不是和平地走过的,而是在困难的环境中走过的,我们要和国内外党内的敌人作战。谢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他们给了我们以武器。这武器不是机关枪,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sup>[1] (p1469)</sup>应当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于广大民众的吸引力在于,它为人们清晰地描绘了一个没有贫穷、没有阶级剥削与阶级压迫、实行实质性平等的美好社会发展前景和终极性理想的价值目标。这一美好的前景和理想的目标,对于长期处于战乱和分裂状态的、深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之苦的广大民众(尤其是广大农民和工人)来说,自然会产生极为强大的吸引力。这种情况可以说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中共领导的革命以及未来的执政提供了“来日合法性(forward legitimacy)”<sup>①</sup>。

二是旧社会的“负面合法性”。这是中共领导革命过程中的重要合法性资源之一。所谓负面合法性,是指统治者执政过程中出现的弱点和缺陷等负面效应,如统治绩效不高或呈下降态势、制度不完善不公正、社会不平等不统一等,导致了被统治者对于统治者的认同度下降,甚至是暴力的抗争。而旧社会的“负面合法性”,一般是指建立在旧社会的缺点和缺陷之上的合法性资源,它是通过未来新社会和现实社会的比较,从而产生出的证明未来社会的合理性和优越性,并把民众的信任和忠诚转移到未来新社会之上的一种合法性资源。在中共领导革命、进行政治动员过程中,旧社会的“负面合法性”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1)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上存在的混乱与黑暗的现实,特别是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腐朽、无能的统治。关于国民党丧失政权的原因,美国方面即把腐败列为重要因素,“中华民国”政府的失败,“不是因为援助不够。我们派往现场的观察员报告说,在至关重要的1948年,国民党军队并未由于缺乏武器弹药吃过一次败仗。国民党的抵抗力量之所以遭到极大削弱,实际上乃是战争初期我们派驻重庆的观察员所见到的那种腐败现象”。而恰恰就是因为国民党的腐败,最终造成了“中国的人心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的事实<sup>[2] (p259-260)</sup>。(2)现实资本主义国家的种种弊端。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公正、资本主义民主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李大钊在1923年就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我们永远不会享福,不会安逸;能够安逸享福的,唯独那少数的资本家。资本主义制度能使社会破产,使经济恐慌和贫乏,能使大多数的人民变为劳动无产阶级,而供奉那少数的资本家。”<sup>[3] (p461)</sup>毛泽东在1949年召开的新政治协商筹备会上强调了帝国主义的腐朽和堕落“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帝

① “来日合法性”是指统治者在未来可以给社会带来什么。(参见美国学者S·P·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177页。)

国主义制度走向全部崩溃的时代,帝国主义者业已陷入不可解脱的危机之中。”<sup>[1](p1466)]</sup>在这里,资本主义制度就是一种“放出道德恶臭的东西”<sup>[4](p112)]</sup>,因此,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自然不应走那腐朽的资本主义道路。而作为新生事物的社会主义才是理所当然的不二选择。中国的未来只能属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归宿<sup>[5]</sup>。

三是苏联榜样的示范。当时的俄国被西方认为是欧洲“社会经济落后区”的代名词<sup>[6](p565)]</sup>。这种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与“经典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文明前提”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因而从理论上讲,俄国是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政权的条件的。但是,苏联不仅做到了,而且在其早期的社会主义实践中,社会经济各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经过1928—1937的两个“五年计划”的发展,就实现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巨大转变,一跃而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强国。这样的发展成就充分展现了社会主义能够迅速改变落后国家面貌的威力,从而为社会主义赢得了声誉。这对于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来说,无疑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当然也为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所领导的以社会主义为取向的革命,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李大钊在十月革命胜利一周年之际,发出了预言般的呐喊:“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sup>[3](p117)]</sup>这表明未来的中共革命将“以俄为师”。

## 二、新中国前30年的政治合法性来源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中国共产党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不仅结束了长期的战乱和分裂,而且实现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目标,这引发了广大民众对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强烈的民族主义的认同情感。有学者就认为,国家的统一成了中共的“一笔殷实资产。国家统一是振兴中华的必要条件,是一切爱国的中国人衷心期盼的目标”<sup>[7](p71-72)]</sup>。还有学者在谈到当时的中国农民的政治态度时指出:“打着彻底革命改造中国,一洗过去令人羞愧的历史经验旗号的共产党,越来越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一夕之间,守旧的农民被共产党带入了勇敢的新世界中。”<sup>[8](前言p17)]</sup>

夺取政权不易,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国家更难。但是,这些困难几乎被那种战天斗地的革命乐观主义所轻视、所淹没。毛泽东乐观地指出:“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sup>[9]</sup>在这里,“后发”完全变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优势。广大民众也深受这样的革命乐观主义情绪感染的,他们不仅相信中共领导的新政权可以为民众创造更加美好的社会生活,而且也积极投入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建设的洪流之中,他们乐意“把自己的才能和力量献给国家,并使个人的目标服从于国家的需要”<sup>[10](p835)]</sup>。

应当说,这种基于民族主义基础上而生成的革命乐观主义,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这一时期的合法性最为主要的就是由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构成的。

中共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高举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完成了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历史任务,那么,在建立政权之后,中共也必须继续高举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如果说,中共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高举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那是一种以“来日合法性”为目标的政治承诺和政治动员,那么,在建立政权之后,中共继续高举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不仅要兑现革命时期做出的政治承诺,而且要按照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建立起符合意识形态要求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秩序。因为关于美好未来的描述和承诺要想转变成现实的合法性来源,只有加以实现和兑现,才能发挥其持续的合法性辩护功能。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这种合法性辩护功能,用另一种话语表达,就是: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来塑造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指导新生社会的改造,指导新生政权的建构和运行。对于意识形态的这种功能,毛泽东曾有经典的表达:“社会意识形态是理论上再造出现实社会。”<sup>[11](p210)]</sup>

为了更好地发挥意识形态合法化的功能,为了使广大民众更加认同和支持社会主义政权,那么在政权的建构上,就要构建维护广大民众而不是“剥削阶级”(通常是指“地富反坏右”)利益的政治经济秩序。有学者对新中国之下的农村基层政权有如下的描述:“不但正式的各级行政机构延伸到乡间,共产党本身还设置了与之平行的机构,以确保基层民众会贯彻党的决策。1958年,集行政、经济、教育及医

疗等功能于一身的公社——成立,将所有农民整合在这种全面性的组织之中。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政权能够如此深入地控制农民的日常生活。”<sup>[8](前言p18-19)</sup>当然,在建构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秩序的同时,还要一如革命时期那样继续进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以便更好地发挥意识形态的合法化功能,保障制度运行的效益。所以在中共的执政理念中,也就形成了“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sup>[12](p243)</sup>的思想。正是由于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高度重视,于是,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了一种“全国性文化”:“传统上小型、半自治而独立的农村社区,慢慢被以中央政府为主的大众文化所取代。层峰的决策,极有效率地一路贯彻到最基层,只作了些微的调整。政治机构深入村级单位,村中干部以充满政治术语的词令,每天宣导党中央的指示。……这一切似乎撤除了传统上地理的及社会的藩篱,助长了全国单一文化的形成。”<sup>[8](前言p21)</sup>

总之,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中共获得执政合法性的理论依据,并成为中共执政初期最为重要的合法性资源之一。尽管在这一时期曾经出现过社会主义发展的曲折,但是,意识形态仍然不失为中共执政重要的合法性资源。虽然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统治绩效(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限制,但意识形态合法性功能的“时间限度”<sup>①</sup>在这一时期还没有表现出来,它的合法化功能还具有一定的发挥空间<sup>[13]</sup>。虽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所作出的一些承诺,因这一时期统治绩效平平的限制,而未能得到有效地、及时地兑现,但是,人们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所提供的远大理想、社会目标的感染和激励之下,还可以去忍受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各种困难,并继续保持着旺盛的革命热情,铸就“激情燃烧的岁月”<sup>[14]</sup>。同时,在这一时期,毛泽东的个人魅力也是一个重要的合法性资源。这一合法性资源和意识形态合法性资源相辅相成,几乎是高度融合在一起的<sup>[15]</sup>。

### 三、改革开放期间的政治合法性来源

“文革”的结束标志着—个时代的结束和改革开放时代的开启。这是因为,“文革”结束之时,我国的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民众的生活仍在低水平徘徊,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民众对党和国家的政治认同度、政治信任度下降,党和国家的政治形象受损,甚至党的执政地位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sup>[16](p119)</sup>。作为执政党的中共来说,它必须探寻新的合法性资源,以便应对出现的合法性危机。这也就是说,此时的中共必须实现合法性资源的转换,过去那种强调“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已不能够再生产出合法性,因此,为了保持政权的稳定和国家的发展,就必须尽快找到合法性的出路,以弥补出现的合法性的真空。

中共在合法性资源转换方面的努力,集中表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上。这一战略决策拉开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序幕,特别是1992年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重大改革举措,更是把中国经济发展推上了发展的快车道。应当说,持续的经济增长,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增进广大民众对中共执政、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和支持的程度,中共执政的合法性也会因此而生成,中共执政合法性的再生产也会因此而延续,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才会得以巩固。因此,在这一时期,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政绩合法性成为中共执政重要的合法性资源。

可以说,改革开放的推进过程,就是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政绩合法性资源转换和深化的过程。放弃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从合法性的角度来看,就是要改变意识形态合法性色彩过于浓厚的问题。为此,首要的就是要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定位问题以及社会主要矛盾的定位问题。1981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给予了明确回答。会议认为,我国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要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就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改善民众的生活。邓小平在1982年9月18日会见金日成时就这样说道:“‘四人帮’叫嚷要搞‘穷社会主义’、‘穷共产主义’,胡说共产主义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简直是荒谬之极!……社会主义必须

① 所谓意识形态合法性功能的时间限度,是指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意识形态的解释力将随之下降。亦即随着时间的推移,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功能将随之而递减。

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sup>[17] (p10)</sup> 他在1985年4月15日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副总统姆维尼时也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sup>[17] (p116)</sup> 那么,如何发展生产力,改善民众的生活水平?这就要改变原有的以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调整原有的以重工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据统计,在毛泽东时期,国家资金主要用于发展重工业,而“对农业的投资只占国家投资额的12%,而用以发展消费品工业的投资仅仅占国家总投资额的5%”<sup>[18] (p481)</sup>。这样的经济结构和经济战略必然带来民众物质尤其是消费品的匮乏。因此,改革开放之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最为主要的措施就是实行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和经济结构的转型,即放弃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模式,调整三大产业结构,尤其是提高轻工业的比重。判断改革开放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sup>[17] (p372)</sup>,就是在经济结构转型中形成的。而通过经济发展,让民众获得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利益,提高了民众的生活水平,民众有了获得感、幸福感,自然也就增进了民众对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认同。

需要说明的是,正因为有了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政绩合法性资源,才使得中共经受住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外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的考验。因此,邓小平特别强调“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sup>[17] (p370-371)</sup> 在1992年十四大之后近20年的时间里,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一直保持着高位增长(1998年、1999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GDP增长率低于8%)。在快速的经济发展的推动下,我国GDP的世界排名发生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更迭——从1990年世界排名第十,到1995年世界排名第七,2000年世界排名第六(超过“西方七强”中的意大利),2005年世界排名第五(超过“西方七强”中的法国),2006年世界排名第四(超过“西方七强”中的英国),2007年世界排名第三(超过“西方七强”中的德国),再到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可以看作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带来的成效,当然也是增强民众合法性支持的重要基础。

#### 四、新时代的政治合法性建构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我国经济呈现快速发展、赢得合法性支持的同时,也逐渐表现出一定的局限,即出现了贫富分化和阶层固化的社会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社会信任,削弱了社会团结,造成了社会道德滑坡,影响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甚至影响到了执政安全。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频繁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就说明了这一点。这从合法性的角度来看,就是我国在经济取得巨大发展的同时,合法性资源却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流失的态势。早在1985年3月7日,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的一番讲话,值得我们警醒。他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sup>[17] (p110-111)</sup> 因此,在我国开始向“强起来”的目标迈进的关键时刻,在我国开始着手实现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关键时刻,我们必须关注合法性问题,关注合法性再生产模式的转型与升级。应当说,在当前的中国,合法性再生产模式的转型与升级已经成为一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政治议题。

众所周知,提出并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方针,强调“用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sup>[19] (p196)</sup>的政治策略,采取“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sup>[17] (p23)</sup>策略和方法,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对解决当时中国面临的社会政治问题、摆脱经济发展困局有着重要作用。可以肯定地认为,“用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的政治策略,在十八大之前一直是我们施政的主要手段。但是,这种用经济手段解决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策略的局限性已经凸显,经济增长合法性的生产和再生产能力下降。如果说十八大之前的改革开放期间,中共的合法性的生产和再生产模式主要是以经济增长为动力,那么,进入新时代之后,经济增长的生产和再生产合法性的动力已不足,经济办法已不能完全解决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因此,必须进行合法性再生产模式的转型与升级。

在新时代,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进行政治合法性的建构。如果说新中国前30年的政治合法性主要来

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改革开放期间的政治合法性主要来自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政绩,那么,新时代的政治合法性则来自意识形态、经济增长、政治发展、社会进步等方面的综合。由于前面两种合法性模式属于特定合法性类型<sup>①</sup>,新时代的合法性模式则属于散布性合法性类型<sup>②</sup>。由于特定的合法性资源对于解决某一特定时期的特定主题是非常有效的,但是,也正是由于它的合法性功能的特殊指向性,以至于在它面临时代变迁和执政环境变化之时,它的合法性功能就难以正常发挥,从而出现合法性的危机,并在客观上要求合法性资源的转型<sup>[15]</sup>。由于我国的改革是按照先易后难、先外围后核心的进路进行的,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sup>[20]</sup>,改革剩下的都是硬骨头,这就决定了我国改革与发展面临主题和任务是综合性的、多维度的,因此,中共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作出了要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并强调“必须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sup>[20]</sup>“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意味着合法性生产和再生产模式的转换与升级,意味着由特定合法性资源的生产和再生产到散布性合法性资源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转换。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sup>[21]</sup>,其中,“美好生活”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它不仅指物质上的东西,而且更强调精神上的内容。只有满足了、实现了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才能赢得民众的合法性支持,才能源源不断地再生产出合法性资源。当然,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本身,即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合法性再生产认识上的深化,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决心。

## 五、启示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史中,对政治合法性及其来源的探索是积极而富有成效的。尽管在赢得合法性资源的过程中也有一些曲折,但是,中国共产党总是能够及时纠正偏差和失误,并始终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政治合法性资源变迁的考察,我们有如下三点启示:

第一,合法性资源的构成不是一成不变的。合法性资源有其合宜性,也就是说,在一个时期适用的合法性资源,在另一个时期未必合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保持警醒,时刻对合法性资源的有效性进行评估,以便及时进行合法性资源的革新以及获取合法性资源方式的变革。例如,旧社会“负面合法性”资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及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是非常有效的合法性资源,这在那些经历过旧社会的民众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效力会逐渐下降。虽然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不能忘记“来路”,不能有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但是,毕竟时间犹如过滤器,过去的东西会逐渐变得模糊。而且一些事情只有经历过,才是深刻的,对于那些没有经历旧社会的新生代来说,尽管历史教育会有作用,但无论如何都产生不了身临其境的感觉。因此,我们必须再生产出新的合法性资源,以防止旧社会“负面合法性”资源效用下降而产生的风险。

第二,合法性资源的建构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合法性资源的建构是争取民心、赢得民心的工作,只有心里装着人民,处处为人民着想,才能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此可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官员的腐败行为就是对合法性建构的一种损害,腐败行为不仅有害于党和政府的形象,而且会导致民心的离散。民众痛恨腐败,反腐有助于赢得民心。人民群众是党的领导的政治合法性的最根本的来源,党如果能够源源不断地从人民群众那里获取信任和支持,那就能够源源不断地进行合法性资源的生产和再生产,就能保持党的执政地位的稳固。

<sup>①</sup> 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指出“特定支持源于那种成员在它们出现后或出现前已认定符合自己要求的输出所刺激的友好态度和倾向。”他还指出“特定的酬报有助于补偿未能满足全部需求时的任何不满情绪。”(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329页。)

<sup>②</sup> 戴维·伊斯顿认为:散布性支持“构成了一个友好态度或善意的蓄积池,它将帮助成员承认或容忍那些他们反对的或认为会损害其愿望的输出”。他进而指出:散布性支持“构成了一个支持蓄积,这种蓄积在输出不能与要求的输入保持均衡时,可以使系统平息许多风暴”。在一定程度上,散布性支持克服了特定性支持不能在什么时候均满足所有人的要求时,所可能引发的毁灭性的打击。(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329页。)

第三,要注重制度合法性的建构。一方面是因为来自制度的合法性是长期的、稳定的、具有连续性的。值得肯定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已经意识到了制度的重要性,并在制度建设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努力。另一方面是因为个人魅力型合法性是不稳定的,而且不具备再生产合法性的能力。英国学者帕金指出“个人魅力制一经产生,它的衰落过程就开始了。”<sup>[22]</sup> 邓小平同志也曾经对历史做出过反思,认为“个人的分量不要太重”,“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sup>[17]</sup>。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制度合法性建设的重要性<sup>[23]</sup>。

#### 参考文献:

- [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约翰·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M].程宗家,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
- [3]李大钊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 [4]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M].黄胜强,许铭原,译.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
- [5]郝宇青,安琪雅.中共执政的旧社会“负面合法性”的功能及其限度[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8(4):40-49.
- [6]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M].郑明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 [7]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M].王建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 [8]黄树民.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M].素兰,纳日碧力戈,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
- [9]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J].红旗,1958(1):1.
- [10]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M].金光耀,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 [11]毛泽东哲学批注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 [12]毛泽东选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 [13]郝宇青.“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政治议题提出的理由[J].行政论坛,2019(5):42.
- [14]齐卫平,郝宇青.中共执政合法性模式的转换:现状与前瞻[J].太平洋学报,2010(11):1-10.
- [15]郝宇青,吴满.中国共产党执政新议题:从特定合法性资源到散布性合法性资源的转换[J].探索,2014(6):62-68.
- [16]弗雷德里克·泰韦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M].王红续,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1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8]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M].张英,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 [19]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20]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N].人民日报,2013-11-16(1).
- [2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N].人民日报,2017-10-28(1).
- [22]弗兰克·帕金.马克斯·韦伯[M].刘东,谢维和,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 [23]周尚文,郝宇青.个人的分量不要太重——邓小平关于领袖个人作用问题论述的几点启示[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1-8.

(责任编辑:郭荣华)